

乔亿及其《大历诗略》

郝润华

乔亿（1701—1788年），字慕韩，号剑溪。清代宝应（今属江苏扬州市）人。乔亿出生书香门第之家，祖父乔莱，曾任康熙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等职，晚年潜心治学，又喜汲引人才。乔莱古文师汪琬，极受时人推许，著述颇丰，有《系辞》、《乔氏易俟》、《崇禎长编》、《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宝应县志》及《古文分类粹编》等，他还善诗、词、曲，生平与王士禛友善，常切磋酬唱，乔莱作品全部收在《南归集》、《直庐集》、《石林赋草》、《白田唱和集》及《香雪亭新编者英会记》等集中。乔莱一生为人豁达正直，史称“卒之日，朝野莫不悲之。”^①乔亿的父亲崇修，字介夫，号念堂，亦善诗，又工书法，尤擅八分书。曾官铜陵县教谕，生平与史学家王懋竑友善，时以道学相切磋。乔崇修生平著有《鸡肋集》、《陶园诗文集》等。乔亿的二位伯父：崇烈、崇让都是康熙末年进士。据道光时《重修宝应县志》载，他们二人皆善书画，崇让尤以画猿与花鸟闻名于世。从此可见，乔氏一族在清代均为世宦、文人，门第显赫。受祖、父辈之影响，乔亿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与诗歌研究，他的五言诗独宗汉、魏，近体初学初、盛唐，后亦近大历、元和，也颇能自树一帜。《重修宝应县志》称，乔亿平素善谈论，年轻时“以国学生应棘围试，不售，辄弃去”。^②其后潜心读书、治学。乔亿平生与沈德潜、查慎行交游甚厚，相互吟诵唱和，十分

相投，沈、查二人都是当时的诗坛领袖，他们的诗文成就对乔亿无疑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乔亿也成为当时江南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作收在他所编的《小独秀斋诗》、《窥园吟稿》等集中。乔亿不仅喜作诗，同时也用力进行诗歌编辑和诗歌评论，据《宝应县志》载，他所编的古诗总集有数十种，著名的有如《古诗略》（一作《古诗约选》）、《兰言集》及《大历诗略》等，他的另外几部著作如《杜诗义法》、《剑溪说诗》、《杜诗偶评》、《诗蒙集》及《王孟韦柳诗评》等则体现了他的诗评功力。乔亿的文章也很有特色，颇为古雅，收入其《剑溪文略》和《剑溪外集》中。除诗、文外，乔亿还治力于经、史的研究，他所著的《元祐党籍传略》，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一部力作，他的《暮齿宜鉴录》和《易林杂录》二部书则是他用力治经的结果。乔亿一生著述有二十余种，大部分收在他的《乔剑溪遗集》中，此丛书有乾隆、嘉庆间刻本行世。

《大历诗略》六卷，是乔亿所编诗歌总集中的一部，为乔亿晚年的研究成果。据《大历诗略·序》记，此书的编撰开始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完成全书，历时十四年，其间曾四易其稿，可见其用力之勤。此书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间刻成行世，当时乔亿已七十一岁高龄，此书刻成后十六年乔亿卒。

乔亿编选《大历诗略》的目的，从其“自序”中可以推为三点：首先，乔亿编选此书是为了宣扬大历诗人及其成就，这是编此书的主要目的。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指的是从767年到779年这一段时间，而文学上的大历时代就不仅仅局限于这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人们所说的大历诗人，他们的大部分生活时代是从唐代宗初到德宗贞元年间，象著名的大历十才子，即是指活跃于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前人对于唐诗研究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对于大历诗歌虽有断续零星的评说，却缺乏系统的研究。乔亿首先

认识到大历诗歌在整个唐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附录于《大历诗略》前的“说诗”中说道：“古人诗境不同，譬诸山川，杜诗如河岳，李诗如海上十洲，……大历十才子诗如巫山十二，各占一峰。”乔亿甚至将大历诗与开元诗相提并论，他说：

“为诗者不祖开元、大历有故，一为格韵高，非后人易到。但习复长庆以下诗为便利，以至琐碎寒窘，入鄙体、俗体而不自知。一为语清省，无以展拓才思，径放笔为韩、苏，规模始大，以至乱杂无章，名野体而不可得，是无惑乎？学如牛毛，成如麟角也。”

乔亿不仅提高了大历诗的地位，而且给以很高的评价，这在诗论史上是一个创新。因此，他编选大历十才子以及大历时代的其他诗人的诗作，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大历诗歌的成就。其次，乔亿编选《大历诗略》是为了与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与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二书并驾齐驱。乔亿的祖父乔莱、诗人王士禛友情甚厚，乔亿又与沈德潜相交游，无疑他的文学创作与研究都会受这二人的影响，况且王、沈二人又都是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主“神韵”，沈德潜倡“格调”，各以其诗歌理论独占一方。乔亿“说诗”中屡言“气味”、“规模”、“格韵”等，实质就是指诗的“气韵”与阔大雄浑的意境，这二者正是王士禛与沈德潜论诗的主要内容。王士禛据“神韵说”编《唐贤三昧集》。沈德潜选编《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即突出唐诗阔大雄浑的主调。乔亿的诗歌理论实质是中和了王、沈二人的理论，他所提倡的“格韵”，就是沈、王二人的格调与神韵的结合。乔亿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既受王、沈二人的影响，那么显然他的《大历诗略》也是受王、沈二书的启发而编成，这一点他在《大历诗略·序》中也有明确的交待。他说《大历诗略》一书，“虽不逮王渔洋《三昧》之超，系沈文愬《别裁》之该备然。”《大历诗略》一书编选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为了给人们公正地研究、批评大历诗

人与诗作提供一部全面的资料。大历诗歌需要宣扬，同时也需要批判。“大历诗品可贵而边幅稍狭，长庆间规模较阔而气味逊之。”^③这是乔亿对大历诗歌的一个总体评价，是比较客观的。至于大历诗歌究竟如何，仍需进一步认真细致的探讨、研究，而《大历诗略》的编成，“则大历之体制无遗是编也”，“此则导夫先路为四达之梯航也”。很显然，《大历诗略》不仅收集大历时代的诗歌，而且在对大历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这不仅为人们研究大历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为后人系统研究大历诗人及其作品开了先河。这是乔亿编《大历诗略》的又一目的。

《大历诗略》共六卷，收录了中唐，确切讲是从天宝到贞元间三十二位诗人的作品五百二十六首，卷一录刘长卿诗八十五首，卷二收钱起诗七十二首，卢纶诗二十一首，卷三收郎士元三十首，韩翃诗三十三首，司空曙二十首，崔峒六首，耿纬六首。卷四李益四十四首，李端二十六首。卷五李嘉祐二十三首，皇甫冉四十四首，皇甫曾十五首。卷六刘方平十四首，柳中庸七首，蒋涣一首，秦系一首，张继七首，严维六首，顾况十二首，郑锡三首，戎昱七首，姚伦一首，戴叔伦十一首，于良史一首，张众甫二首，章八元一首，张南史六首，刘商二首，刘复三首，冷朝阳一首，朱放三首。刘长卿诗“体气开大历之先”，所以放在首卷，卷二至卷五，为大历十才子之诗，说是十子，其实是十二位。关于大历十才子，据《极玄集》与《新唐书·卢纶传》，他们分别是：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纬、夏侯审及李端十人。宋江休复《嘉祐杂志》则为十一人，去了韩翃、崔峒和夏侯审三人，增加李益、郎士元、李嘉祐和皇甫曾四人，而乔亿的《大历诗略》则去了吉中孚、苗发、夏侯审三人，增进了皇甫冉，“以钱、郎、三李（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分列中四卷，为之冠，卢、韩、司空、崔、耿及冉弟曾各缀

于其下。”“刘方平以下十九人先后翱翔于天宝、贞元之际，不皆与钱、郎诸家接席而散帙，清华之气湛若方新，无弗同也，惟刘复气韵尤高，顾况歌词骏发踔厉，而外录其能似类者，或昱、戴叔伦尚存雅调，都为卷末。”^④这样以来，“大历之体制无遗是编也”。

《大历诗略》不仅只是全面选录大历诗人的诗歌作品，而且还做了其它工作。首先，它在每一位作者下均写了小传，略言其生平事迹、文学成就，内容大多出自两《唐书》等，可信程度较高。其次，它的选诗按先五言，后七言；先古体，后近体的顺序排列，佳句、警句时有圈点，大部分诗都有评注，对作品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及作家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最后，对每位作家都作了总结性的评价，也颇为中肯。可见，其评注形式与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颇有相似之处，也可以说乔亿此书确受沈德潜的影响。

《大历诗略》所选录作品并非仅是大历十才子的作品，而是从唐天宝至贞元年间诗人的代表作品，他们的诗歌尽管各异其趣，然而他们的总体诗风却有相似之处。大历诗的风格特点是清空疏秀、语言雅致洗练，就象乔亿所总结的“格韵高”、“语清省”，这种诗风似乎在大历时代的所有诗歌中都有体现，就因为大历诗歌的独特风格，所以它才代表了唐诗由盛唐转入中唐这一时代的诗歌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大历诗毕竟缺乏盛唐诗歌的那种“气象”，正如许学夷所论：

“中唐诸子，造诣兴趣所到，化机自在。然体尽流畅，语半清空，其气象风格，至此而顿衰耳。”

这是极其公允的评价。乔亿在《大历诗略》中对每一位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也是建立在他对作品的认真体会和对诗人的仔细考察之上，所以，大都比较客观。如刘长卿，他与钱起齐名，并称“钱刘”，是大历诗的先驱诗人，平生致力于近体，尤工五律，

有“五言长城”之誉，他的诗言语清朗，情韵俱佳，颇为后人称赏，清方东树以为“文房诗多兴在象外，专以此求之，则成句皆有馀味不尽之妙矣”^⑥。乔亿在刘长卿的《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诗后评道：“文房五言皆意境好，不费气力，此尤以不见用意为长。”并总结说：“文房诗为大历前茅，清夷闲旷，饶有怨思。”与方东树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首，其近体诗闲雅纤秀、语言精炼，其五绝《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步武王维《辋川集》，从形式到内容，在大历诗人中，钱起均可接迹王右丞，无怪乎乔亿说钱起诗“如芷珠春色，精丽绝尘，右丞以后一人而已”。乔亿在评诗时还有其独到的眼光，他将皇甫冉的作品收录四十四首，而且给以适当的评价，他说：“补阙诗，五言之善者，犹夷绰约，有何仲言之音韵，特歌行体弱耳，律诗当于李从一（嘉祐）比肩，精警或不足而闲淡过之矣。”历代研究皇甫冉的人很少，乔亿能够做出如此独特、深刻的分析评价，确是难能可贵的。乔亿对崔峒、韩翃等人的研究也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崔补阙诗结体疏澹，似不欲锻炼为功，品第当在韩君平之上，而才调则逊之”，“韩舍人翃才调翩翩，大历能品”。乔亿评诗重诗的“品第”、“才调”，可见是受前人评诗的影响。他以为崔峒诗没有韩翃诗的洒脱才调，但品第却在韩翃诗之上。乔亿重点研究的另外一位诗人是中唐著名诗人李益。李益是位边塞诗人，他的边塞诗内容丰富，思绪深沉，多豪迈、慷慨之气，他是中唐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他的近体诗为时人称许，尤其是七绝诗，凝炼含蓄、韵味悠长，深得明、清人的赞誉，明胡应麟即以为“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⑦。乔亿收录李益诗四十四首，并对李益作了概括评论，他说：

“李尚书益久在军戎，故所为作多风云之气。其视钱、刘、岑参之于王、孟，鲍照之于颜、谢也。七绝尤高，在大历间无与颉颃者。”

乔亿不仅充分肯定了李益的诗歌成就，而且对李益的边塞诗与七言绝句给予很高的评价，尤其是他将李益与鲍照、岑参相提并论，这是前人所没有提及的。

《大历诗略》作为一部唐诗总集，也有它的不足之处，首先表现在收诗方面，它的收诗并不全面。比如，既然是收录大历诗人的作品，作为大历十才子的吉中孚、苗发及夏侯审三人的诗却一首未收，这是本书的一个缺憾。另外，由于乔亿选诗的标准受王士禛、沈德潜的影响，一些关心民生疾苦，现实性强的作品未予收录，而那些闲淡庸禄的作品却选录了不少。其次是对诗的评价方面也有失当之处，过于强调诗歌的品第、才调、气韵等，却忽略了诗的内涵和现实意义，比如李益的《夜上西城听梁州曲》、

《从军有苦乐行》等诗，乔亿均未做出深刻的评论。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缺点。尽管如此，《大历诗略》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唐诗选本，尤其在介绍诗人宣传大历诗歌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乔亿在编选中注重大历诗人的各体兼备，因而在重点选录了刘长卿、李益、皇甫冉、郎士元、韩翃等大家、名家的诗外，也选录了不少次要作家和小作家的诗。他能够注意到大历、贞元时代不同流派和不同体裁的作品，入选的题材和风格也较丰富多采，从而反映了大历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因此，《大历诗略》一书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大历诗人及其诗歌的了解，而且对今天研究大历诗人及其诗歌还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大历诗略》有清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居安乐玩之堂本。

注：

- ①《清史·乔莱传》
- ②《重修宝应县志》卷二二
- ③《大历诗略》附录《说诗》
- ④《大历诗略·序》

⑤《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二—

⑥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八

⑦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

刘桢为宁阳何处人

关于建安七子之一刘桢的籍贯，我曾写过一篇《刘桢应是宁阳人》的短文（发表在1991年5月3日的《齐鲁晚报》，后收入《文史漫笔》一书），辨明古时言刘桢为东平人是从侯国的较大范围讲的，确切地说刘桢应该是东平国宁阳县人。但因时代久远，且无史料能作进一步的证明，所以刘桢的故里具体在宁阳县的何地无法考证。

近读新编的《宁阳县志》，里面谈到在宁阳县城东北20公里处的堽城镇有个刘伶墓村，这里有座较大的古墓，封土高四至十米，墓地最大直径约二十米。相传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醉死后埋于此处，因呼之为“刘伶墓”。但经过考古调查，发现墓地周围汉代砖瓦碎片散布颇丰，应该是座汉墓。东汉光和年间，宁阳有位刘梁，官拜尚书郎，后为野王令。古人死后有葬于故土的习俗，因而认为“刘伶墓是刘梁墓的讹传”。且据元代的《齐乘》记载，刘伶墓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西王乡刘曜村，并有刘伶泉、刘伶台作证。可见，刘梁的故里应是今宁阳县堽城镇刘伶墓村。据《后汉书·刘梁传》载，刘梁是刘桢的祖父（一说刘梁是刘桢之父），故刘桢的故里自然也应是今宁阳县城东北20公里处的堽城镇刘伶墓村了。

· 徐传武 ·